

LÜXING KUA WENHUA XIANGXIANG

旅行：跨文化想像

◎ 郭少棠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旅行：跨文化想像

郭少棠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行:跨文化想像/郭少棠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

ISBN 7-301-04810-6

I. 旅… II. 郭… III. 旅行-文化-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K9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0579 号

书 名: 旅行:跨文化想像

著作责任者: 郭少棠 著

责任编辑: 张文定 张晓蕾

标准书号: ISBN 7-301-04810-6/G · 062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 pup@pup.pku.edu.cn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54

排 版 者: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 246 千字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序

上世纪 80 年代，我在云南旅行时，听到楚雄某些彝族学者的论点，说彝族乃发源于楚雄一带，新出土的元谋原人及彝族十月太阳历均可证明此一文明发轫之早。其后这个拥有黑虎图腾与太阳历的民族向西北迁徙，有进入巴蜀乃至康藏的，成为川康氐羌或藏人。再往北，则成为陕甘羌族。向东北方走的，就逐渐扩及黄淮平原，再经东北，跨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大地。换言之，彝族几乎可说是亚洲、美洲的文明之源。我国古代的《易经》、《老子》、《楚辞》中均可找到不少证据。

对此类以自我一族为世界文明中心的论调，我当然是哑然失笑的。但仔细一想，就赫然发现：这个大迁徙的想像，其实正是我们对于人类文明的基本解释。

例如清朝末年时流行的中国人种及文明西来说，曾经影响深巨。著名学者苏雪林写了几百万字，想证明《楚辞》所显示的乃是巴比伦的神系与世界观。其他学者论证墨子应是非洲黑人或印度婆罗门。古代中国的星宿、太岁名称，亦有不少考证，说它们源于这源于那。台湾的毕长朴先生则倡言一种中国人种北来说。此外，人类学界对于人类文明也有起于非洲北端，再逐渐扩散全球和起于印度尼西亚群岛等各式主张。彝族学者所主张的便属此类说法之一。

反对此类文明一元论的，辄主张文明多元论：各洲各有人种，各有文明，各升各火，各因各果。

虽然如此，文明多元论者亦不认为文明源生于某地之后，即定著于该地，无迁徙无交流。只不过他们通常采取区域扩散的讲法，不似

文明一元论者讲得那么恢张，老是做纵横十万里的大规模迁徙。

古代文明间的徙移与交流，到底该恢张点说，还是谨慎点讲，很难论定，因为谁也不能断言古代人类不是像候鸟般往来迁徙的。一只伶俜燕雁，尚且每年不辞劳苦，度越万里，飞洋过海，何况是人？若说燕雁为何总要如此不惮其烦，谁也说不出，避寒嘛，自有别的办法，何苦如斯跋涉？海上风波、云中罗网，其中之凶险实更甚于寒冷。因此，这或者只能说是物性本能。就像某些动物，一旦出生，就开始远游；待生育期再千方百计旅行返回原生地产育，或临死时再回来。一生就在一来一往的长途跋涉中度过了。若问这样的生命到底意义何在？也没人答得出来，生物的本能，就蕴含着属于它最本质的奥秘。似乎动物之不同于植物，就在于它要徙旅要迁移，否则它就干脆生为植物了。

讲这么多，我要说的是，人的物性本质或本能就是迁旅行游的，人类的文明，便成于旅行之中。

人，这个字在中文的构形中，像人直立之形。人立，是人的物性特征，其他动物只有少数或偶尔能够如此，例如熊。人能站立故能迈开大步走，所以“大”字就像人行立于山川日月之间之形。文明之文，则是物相杂之形。人与人、群与群，要相互交流走动，才能杂，才成文，故古人曰：“物一无文”。

用郭少棠先生在这本书中的术语来说，则我们也可以说明旅行才能达成跨文化交往，让人在文化转换之中，跨出自己的文化封域，通过碰撞、理解而逐渐融会出新的文化视野，达成新的文化创造，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文明不断创发的历程。若人一直局限于他那单一族群、单一文明、单一地域，其文化绝不能发展，因为“物一无文”。

郭先生这本书，用大量史料和理论来阐明这个旅行与文化的关系，认为旅行既是在文化间跨越、转换，又是文化的深化。这是他与时下技术性实用性文化旅游书刊不同之处。相较于西方当前热门的旅游研究。郭先生特重旅游与文化的关系或旅游的文化含义，其实也独

树一帜，且对欧美论者颇具点醒之作用。因为欧美的旅游研究虽然大谈流亡、移民、后殖民、混血儿、探险家、观光客，但实际上缺乏历史与文化视野，基本上是处理二次大战以后大众观光旅游工业所带来的问题。所以卡伦·卡普兰(Caren Kaplan)才会说：旅行无疑是一个现代概念，象征着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年代中的商业与休闲活动。而“位移”更多的是指现代化所造成的群体迁移；杰姆·克勒福德(James Clifford)则承认他所称之旅行一词，乃是与欧洲的、男性的、中产阶级的、科学的、英雄的、娱乐的事相关着，因此据他看，所有的男人都是旅行者。他们都忘了：旅行是如上文所说，或郭先生此书所分析的，古已有之；且是人类之物性本质，男人游，女人也游；又是各文化形成及发展之原理，故而西方现代后现代有旅行有位移，中国更多的是旅行文化及因旅行所创立的中国文化。郭先生此书主要就是向他们说明这一点。

为了与西方当代论者对话，郭先生曾用英文重写本书，然后再译写成中文(最终变成前四章是以英文撰写后译成中文，后四章是对中文起草而再译成英文，又译为中文)。这种面对中英文与文化的努力，实在罕见且教人佩服。他自谓其论著重点在于：探讨中国旅行的文化传统，并强调他做的是中西方旅行的前现代文化传统之跨学科分析，实亦太过谦。他是博雅君子，不似我这般性喜矜张，所以对于自己在反思西方现代旅游及游行理论，建立中国旅行形态分析典范(本书分为旅游、行游、神游)的贡献，不免平淡视之。其实他的工作至为重要，旅游的跨文化分析与跨文化对话之门，要到他这部书出现，才真正打开了。他命我为此书作序，我很高兴能比其他读者先一步拜读如此有意义的稿子，很想好好为它阐发一番，但旅中匆遽，遂仅能略申鄙怀如上，实在非常遗憾。

龚鹏程

2004年12月5日写于

成都南京旅次

前　　言

跨文化旅行研究的尝试

人生如旅。本书的撰写就是一次“奥德赛”(Odysseus)似的旅行，它开始于我在美国伯克莱大学的研究生学习阶段，继续于我回到香港中文大学执教时期。七年前我母亲因癌症住院，两年后病逝，这成为我人生的一个重要界标。作为一名专栏作者，我开始了一系列有关生老病死的自传性写作。这些文章的中心主题是人们在其生命之旅中走过的不同道路。

与此同时，在香港回归前后的几年间，我萌生了对文化旅游的新兴趣。所有这些学术的、社会的和个人的经历，促使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相关的课程。一是旅行与文化，二是文化迁移与现代化。讲授四年之后，累积的讲稿便成为一本中文书籍《旅行：跨文化想像》的初稿。当大量不同类型的历史数据被确认之后，这本初稿排印出来，以便从同事、学生、专家和业余爱好者那里得到建议与批评。总的来看，这本初稿还必须回答几个基本的学术问题，其中有两个较为明显：一是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术语的翻译，二是跨文化诠释中采用的较广泛的理论架构。

初稿中，旅行被分为三个层次：旅游、行游和神游。旅游包括休闲和度假旅行，其目的是在较短的时期内观赏和猎奇。因此，其文化感受是表面的和肤浅的。行游指范围更广的不以消闲度假为主旨的时空移动。由于这类旅行的时间较长，而且通常具有多个目的地，因此所获得的文化感受常常是深层的和理性的。神游并非身体的移动，而是一种意念上的旅行活动，即“精神旅行”。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移动行

为,它所涵盖的时空基本上处于一种抽象的状态。

由此出现两个基本问题:第一,将中文的“旅游”译为 *tourism* 和将“神游”译为 *journey*,基本上可以接受。但是将“行游”译为 *trudge* 则一直不能令人满意。中文的“行游”包含有很广泛的旅行之意,而英文的 *trudge* 则只是具有中文意思的某些方面,即额外的努力与辛劳。此外,初稿虽然非常严格地区分了这三类旅行,但由于这三类旅行中所含的感受常常是相互转换和重叠的,因此,将这些感受人为地格式化又显得过于简单或者具体化。第二,更为根本而且很明显的问题,是初稿的论述架构和参照结构。最初的格式是按照讲课而定的,介绍给学生的是有关旅行的学术研究概况以及我对旅行概念的三分法的展示和分析。我运用西方和亚洲的历史文化经验描述这三类旅行的内容,以证明这一划分是可行的。起初,我花费了很多功夫,以便自己从“行游”一词翻译的黑洞中引出三分的架构。我深入到西方对旅行的学术研究中,以便支援这一划分的可行性。然而,我越是仔细地查看课堂上和最初的讲稿中使用的例证,就越是发现更多的问题。我忽然明白,自己一直在使用一套中文范式分析旅行的概念与现象。当我开始用 *trudge* 作为“行游”的对等词时,这种译法的不可取逐渐暴露出来,因为我并未真正使用西方的概念去分析旅行,而是以为这些概念是普遍适用的。我没有直接处理这种旅行现象的翻译背后的文化差异问题,我太过简单地认为,这种三分概念,是某种“普遍”的东西,无须面对这一划分可能引起的跨文化问题。在与文化历史学家进行了数月切磋并对中西方旅行著作中使用的相关译法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整个思路变得清晰了。由于对中国文化传统和旅行的诠释,这种三分法得以发展。有关中国的旅行体验的一些基本概念,不容易被或者完全被译为英文,过去对中国旅行著作和旅行者的研究不能应付这种跨文化交往的基本问题。

较为达观地回顾一下,整个教学、研究与写作本身是一件很有价

值的事情并且反映了跨文化的经历。既然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文化史的跨文化研究,那么,对于与旅行相关术语意义转换的可行性理论与实践研究就可能会更恰当和更富启发性。深入于文化转换和跨文化交往之后,也可能发现其他的跨文化问题:中西旅行经验和旅行写作传统有多么不同?西方对旅行的学术发现与研究能否有助于对中国的研究?中国的一些独特的旅行文化踪迹能否激发对西方经验的更广泛研究?以两种历史传统之间的一些基本差异回应当代旅行全球化,可能出现什么不同?本研究将有助于阐释上述问题。中西方的旅行文化可以跨越不同而相汇聚。在欣赏这些融会时,两个世界的旅行跨文化经验有助于理解它们的文化发展。

本书的重点在于探讨中国旅行的文化传统,强调对中国与西方旅行的前现代文化传统的跨文化与跨学科分析。第一章主要从反思现代西方的旅游及旅行理论开始,然后进入中国旅行典范的建立。笔者倾向于赞成杰姆·克勒福德(James Clifford)的观点,认为“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旅行”;而通过对“旅”、“行”、“游”的语源学分析,我们发现,中文的“旅”、“行”、“游”有着远比英文的 tour 或 travel 复杂得多的内涵,其中“游”字更是富有微妙的与哲学的含义,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某些特性,这也是本书选用“旅游”、“行游”、“神游”来分别代表旅行的三个层次的原因。第二章以跨文化的视角分析旅游与文化的关系,认为在中国旅游历史的传统中蕴含着强烈的文化内涵,几乎所有的旅游资源都或多或少有文化含义。旅游中主体(东道主)与客体(游客)之间的互动有不平衡的一面,然而也有助于文化身份的认证,旅游并非万恶之源,重要的是建立一种智性的旅游。第三章探讨行游的概念、特征与类型。一般说来,行游比旅游有着更大的时空跨度,行游者的文化感受已经从“猎奇”转向了“寻异”,行游的类型主要有帝王巡游、军事征行、外交出使、商贸旅行、游学求法以及迁徙移民等。行游的文化内涵同样相当复杂,第四章即是对之进行跨文化分析,行游带来文化

冲击与文化固守,同时导致知识的转变、文化的转移与认识,这种影响可能只是个体的行为,但也极有可能涉及广大的社会文化范围。第五章诠释神游的多元含义并探讨文学作品中的神游想像。神游文学作品总是对人类文化进行这样那样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在全球村概念日益流行的今天,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第六章神游的科技想像,以神游的视角诠释时间旅行、星际旅行、网络旅行等科幻文化。在科技与想像的双重连接下,神游的文化含义更加多元,反映人类文化的诠释已经走进一种更具动感的视域。第七章思考神游的梦幻与生死之旅。把生命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生不过是一次孤独的单程旅行,梦幻之旅如神游,同是人生的写照。

对两种学术与文化传统的深入的跨文化考察,实际上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跨文化知识理解的旅程。完成了用英文重写本书之后,我用同样的思路全面修改。如同跨文化交往与诠释所证实的那样,语言向读者清楚地转达了跨文化的资讯。通过用英文撰写,我希望与英语读者分享我对中国文化旅行的理解。至于对原中文稿的修改,我主要转向更直接的比较研究方面,以展示两种文化的差异并且认识中国历史经验以及旅行作品背后的独特的文化价值。用这种方式展示的中文与英文读本,可能有助于证明跨文化研究的复杂性。这本书最终面世的版本结合了以英文撰写而后译成中文的首四章和先以中文起草而后译成英文的后四章,它的完成正好是分别以中英两种不同语言作媒介思考同一个课题的一种文化接触、互动和混杂的尝试。这正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跨文化的研究和想像。文化的旅行像人生的行旅,退一步海阔天空,漂浮中露光辉,表面看去如掠影,核心里却仍是精华的汇聚。从旅游、行游到神游,人生如过客的意义便可充分展示无遗。

在对本书进行不同的思考、研究与撰写阶段,作者得到许多方面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在早期的课程与初稿构想阶段,提供帮助的有同事杨鍾基、邓仕樑及李炽昌等教授。中国语言与文化系、宗教系

和艺术系曾对我组织开设的有关中国旅行文化、朝圣与旅行、艺术与旅行之课程予以协助。当时我的研究生邹重华、董群及杨阳等也曾帮忙不少。特别是云南省社科院历史所前所长段玉明在中文大学修读博士学位期间帮助我收集和编写资料,使本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和具体。北京清华大学的张步洲教授、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张文定先生以及深圳海天出版社的周鸣奇女士为书稿的编审工作花费了不少功夫。当手稿排印出来之后,又得到不同的批评与建议。北京清华大学的王宪明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张展鸿教授对题目提供了一些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看法。四川大学的冯川教授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认为,“行游”的译法很有难度,而“神游”划分的意义正是中国与西方旅行概念不同之所在。香港中文大学的黄念欣帮助我理清了许多与中国旅行相关的词汇与术语。香港科技大学的潘毅从文化研究与人类学的角度详细评价全文并且提出了有益的建议。最后把首四章再翻译成中文和编校,得到左芙蓉、朱丽双和俞强的协助,都应该致谢。

更要致谢的,是在处理本稿的跨文化问题时,杨鍾基教授曾向我提议全面展现本书的理论架构。我还请教了跨文化专家 Jane Jackson 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两位著名翻译学学者刘殿爵教授和孔慧怡博士,最终我决定通过分析中国文化的地位重建理论架构。为了更广泛直接地面对跨文化问题,我选择了用英文撰写,以展现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用英文写成首四章后,发觉原稿的跨文化困难已经基本上得以超越,并且大致上能够和原稿后四章略加调整而衔接,可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最后必须再提一下的是,当两年前重新修改思索“行游”的翻译和中西诠释的跨文化问题时,竟然出现一项意外的惊喜。一位同事给我送来一本龚鹏程教授的近作《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龚教授提出“居”与“游”实际是中国社会构成的两种互动的现象,给人面貌一新。该书是笔者过去几年看到华文世界书写“游”的

历史的最佳作品，与本书可算是异曲同工，互相辉映，充分证明我在课题的学术努力并非孤独无助，算是一份最有力的思想支援。及后在书稿付印期间，蒙他慨允赐序，令小书更得知音题词寄语，大有双剑合璧之势，使小书的创作达到另一高峰。这里衷心向他致敬。

目 录

序	龚鹏程	(1)
前 言 跨文化旅行研究的尝试		(1)
第一章 旅行的跨文化解读		(1)
从现代旅游研究到旅行的文化历史		(13)
中国的旅行典范		(34)
第二章 旅游的跨文化透视		(46)
文化与景观再造		(49)
景观的文化塑造		(57)
中国旅游传统中的文化观照		(61)
旅游与文化身份		(67)
全球旅游与文化保护		(71)
第三章 行游的概念反思		(74)
概念与特性		(74)
行游类型		(76)
侨民与移民		(101)
第四章 行游、文化转化与价值变迁		(106)
行游与知识改变		(107)
行游与文化转移		(114)

行游与文化认证	(131)
行游与文化冲击	(139)
行游与文化固守	(145)
行游与思乡情结	(148)
第五章 神游的诠释与文学想像	(151)
神游的虚拟时空	(155)
文学神游的玄想与乌托邦话语	(157)
模拟游记的文化象征	(169)
童话游记	(185)
第六章 神游的科技想像	(188)
科幻文化	(188)
时间旅行	(190)
星际旅行	(198)
网络旅行	(203)
第七章 神游的梦幻与想像	(210)
人生如旅	(210)
梦与遐想	(213)
人生神游如寄客	(221)
神游死亡之旅	(226)
超越生死	(231)
主要参考书目	(241)

第一章 旅行的跨文化解读

旅行中没有愉悦，我把旅行看成一次精神考验……就像伟大而严肃的科学实践，旅行帮助我们找回自己。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63^①

旅行文化涵盖旅行、远方以及与旅行有关的一切，它还是一种历史视角，人类心理“过客”(passage)的喻词，当综合地而非个别地观察人类时，旅行是一种哲学或形而上学。

C. T. 威廉斯(Carol Traynor Williams)《旅行文化》，页 xiii

同样地，把旅行看作思想的喻词会带来创新性思维图像，它开拓观察事物的新方式，或者新视域……旅行其实是思想的喻词，这一点不言而喻。

佐治·云雅比(George Van Den Abbele)《作为喻词的旅行》，页 xiii

旅行的普遍性和熟悉感或许可以从下述事实得以领悟：旅行是描述各种转换与变迁的喻词最通常的来源。

亚利·里德(Eric Leed)《旅行者的思想》，页 3

我正在尝试为居住和旅行的特殊历史、策略与日常实践勾勒一个比较文化研究方法的概图：居住中的旅行和旅行中的居住。我把旅行视为文化比较，就是出于旅行的历史易染性：旅行和性别、种族、阶级特权、特殊运输方式、修整过的道路、代理、边界、文件等等都有关联。

^① Cited in Eric Leed, *The Mind of The Traveller: From Gilgamesh to Global Tour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p. 1.

杰姆·克勒福德(James Clifford)《旅行文化》,页 108、110

把焦点放到现代对位移(displacement)的后现代讨论成果上,本研究将呼吁关注如“旅行”、“位移”、“位置”这些术语,以及“流亡者”、“旅游者”、“游牧民”这些旅行的特殊形式和身份认同之间的连续与中断。……因此,《旅行质疑》(*Questions of Travel*)会引出现代位移的大量历史结构,随便举几个例子:休闲旅行、探险、放逐、流亡、流浪、移民等等。

卡伦·卡普兰(Caren Kaplan)《旅行质疑:后现代对位移的讨论》,页 2—3

禅宗不太重视朝圣的概念,但是珍视佛教徒从一个主要佛教中心到另一个佛教中心的徒步(“行脚”)游历(“游方”,云游四方;或“参方”,四处旅行),以扩大他们对佛法的理解,向得道高僧请教,并在高僧指导下学习与禅思。人们称托钵僧为“云水僧”,因为认为他自由,如流水浮云一般无牵无碍……就像孔子用许多年时间周游历国,寻找一个诸侯王采纳自己的政治理想。……今天保存下来的大量游记描写了他们参观历史遗迹、风景名胜、宗教圣地的经历。这些旅行,即“游”,包含着大量丰富的活动:享受自然美景,考查历史事实,与过去交流,并通过写诗、作画、做文章,使这些瞬间成为永恒。

韩书瑞(Susan Naquin)、于君方(Chun-fang Yu)编
《中国的进香客与朝圣地》,页 15—16、18

对一个思想的旅行者而言,真正的困难不在于深信多重空间共存的可能性,而是相信某些特定时空确实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个人可以在其中安静而富有意义的生活。……旅行和死亡关系密切,我们在旅行中消逝。……旅行包括开始和结束,两者之间的过程是短暂的,过渡的,不是永恒,随时可能结束。“人生如旅”的描述象征着人类对生命的深刻理解。

胡晴舫《旅行者》,页 124

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大众观光旅游(mass tourism)发育成熟的主要结果,西方对旅行的研究剧增。之前,大多数与旅行有关的著作事实上都是作者个人的行为,对旅行的所有探讨主要涉及两个现象:一是旅行经验的作品,通常称之为旅行著作;二是旅行行为和思想的研究。这两类著述有时会重叠,相互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人们通过采用不同的资料、媒介与视角,对旅行的方方面面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诠释;也可以通过对旅行著作的集中分析,探讨旅行世界的复杂性。对这两种紧密关联的旅行著作的兴趣是在上世纪末突然出现的,正如杰姆·邓肯(James Duncan)和德瑞克·葛里哥雷(Derek Gregory)所指出,这些作品风格各异,区别显著:“从华丽抒情的格调到诙谐传奇的流浪色彩,激发起19世纪的探险传统,决定了20世纪晚期后现代主义的讽刺姿态。”^①由于现代大众旅游业的发展,对它的学术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综合学科。旅游著作的其他研究与诠释更是包罗各种视角,从历史、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到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

随着对旅行著作的研究热潮,另一种相似的兴趣很快浮现出来,那就是抽离概念并用作分析“旅行”的工具。当卡伦·卡普兰分析后现代对位移的论述而提出她的旅行质疑时,显然一开始,她只是质询和旅行及位移有关的分类、概念和喻词。这些范畴在当代欧洲和美国的文艺与文学批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②她进一步阐述道:“旅行无疑是一个现代概念,象征着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年代中的商业和休闲活动;而位移更多指的是现代化所造成的群体迁移。”^③卡普兰在分析旅行问题时,引申出现代位移的一系列历史结构:休闲、探险、流亡、流浪及移民。她把旅行和位移都看作是“各种不同的批评层次与历史例证的符

^① James Duncan & Derek Gregory ed., *Writes of Passage: Reading Travel Writing*,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1.

^② Caren Kaplan, *Questions of Travel: Postmodern Discourses of Displacement*,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

^③ Ibid, p. 3.